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唱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传唱不衰的歌曲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高亢流畅的旋律、质朴激昂的风格,征服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斗争而取得胜利的光辉历程,抒发了广大群众的意志和信念,唱出了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道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史真

抗战洪流锤炼文艺青年

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曹火星14岁便在河北平山县担任村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率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唱歌跳舞搞宣传,堪称便衣“小八路”。1938年春,曹火星加入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建起的抗日文化团体——铁血剧社,此前他在家曾随任小学校长的叔叔学过点音乐,是铁血剧社成立时社内唯一能识简谱者。

两年后,曹火星随剧社到华北联大文艺部音乐系深造。边学边写,自编自唱,首创《上战场》受到表扬。1943年春,曹火星光荣入党,他决心要干好这份文艺工作,以表达对党的感恩之心。其时,适值全党上下都在认真学习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和铁血剧社的同志们以满腔热忱参加到这股热潮中,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行动更加自觉。

铁血剧社不久移驻阜平,改由晋察冀边区抗联会领导。随即,响应毛泽东的讲话,改名为晋察冀群众剧社。曹火星担任群众剧社音乐组组长。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便于有效开展反“扫荡”,1943年秋,群众剧社化整为零,被编成晋察冀边区抗日宣传3个小分队,派往由房山、涞水、涞源、涿县等地组成的平西(北平以西)根据地深入到群众中宣传抗日,参加当地的土改运动。赵冀平带领一个小分队来到房山、涞水、涿州县,后又分为两个小组,曹火星与赵珂、张学明一个小组,翻山越岭来到远近闻名的抗日根据地之一的堂上村。该村地处房山县和涞水县交界处的云霞岭上,海拔1000多米,是个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

曹火星一行三人来后,夜宿中堂庙的偏殿里。白天,边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边开展群众文化活动。除教唱革命歌曲、演戏进行抗日宣传外,还为儿童团编排了一套“霸王鞭”。晚上,他们就埋头潜心搞文艺创编。

主题曲催生颂党赞歌

他们先集中力量斟酌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歌调,为打“霸王鞭”一连创作了4首歌曲。“霸王鞭”是晋察冀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又叫“打花棍”。曹火星等同志把它改编成一种新型的群众集体歌舞形式。前四首歌,由曹火星与张学明运用群众熟悉的小调填词。通过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共产党、八路军的坚决抗战与国民党、中央军反共反人民、不抗日只打内战的对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歌颂抗日根据地民主自由的新生活。

但这四首歌曲先期写出后,曹火星等总觉未彻底写到位,需有一首归纳性强、能进一步说明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的词曲,也就是说,最后需一首明快有力、概括性强的主题歌做精炼总结。

其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企图消灭共产党,摧毁共产党领导的广大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更是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公然叫嚷“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等恬不知耻论调。对此,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与蒋介石针锋相对进行斗争。7月9日,延安举行3万人大会,呼吁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同时拿起舆论宣传武器揭露驳斥种种反共行径与谬论。7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危机。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论,针对蒋介石狂言“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进行有力回击和驳斥,指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鲜明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尤其是《解放日报》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令人震撼。曹火星等众多革命者愈发坚定了钢铁般的信仰和意志,坚定了忠诚与热爱共产党的必胜信念。曹火星更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深深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引导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光明。1943年秋,曹火星接到父亲与堂弟被日军杀害之噩耗而悲愤交加。怀着深爱共产党之情、交织对敌之国恨家仇,曹火星拨动了喷薄欲出的音乐情弦。

10月的一个深夜,在河北涿莱县(现划归北京房山县)常山小学的油灯下,曹火星奋笔疾书创作起来,激情写下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敲定词曲主题后,顷刻间文字如珠玑滚落盘中。

最终道出蓄积心胸的声音,曹火星轻舒长气,反复默读。一不做二不休,他又立刻谱曲,心潮澎湃中音乐旋律的灵感如一匹骏马乘风疾驰。家乡的民间小调、戏曲曲调接续涌来,曹火星眼前浮现出孩子们打起霸王鞭行进演唱的景象。他用了一天一夜,一气呵成了这41个小节、12个单句的歌曲。

次日,曹火星召集儿童团员教唱此歌。12月,在200余名县级干部培训班上教唱之并广为流传。传唱中,随着形势的发展,这首歌曾被相应修改了个别词:原“他坚持抗战6年多”,后唱着唱着,一年加一年,到抗战胜利改成“8年多”。

这首歌曲吸取了“霸王鞭”音乐的音调,体现出板腔体音乐的情绪发展,最终成为一种由主题材料不断发展变化再现而构成的多段并列结构。全曲共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歌曲的前两句,即歌曲核心主题。这里,作曲家旗帜鲜明、先声夺人地表达出歌曲的思想主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二部分结构相对较大,前半部分三句,落音都在“la”上;后半部分从“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开始,节奏逐渐密集,一字一音,类似戏曲音乐中的垛板,将音乐的情绪逐渐高涨。第三部分变化再现第一部分的核心主题,但节奏拉开,音区提高,将全曲推向高潮。

这首代表真理、代表人民大众信念和愿望的歌,唱出了根据地广大军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歌词真挚朴实、通俗精练,曲调亲切明快、易唱易记,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因此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广泛传唱,传遍全中国。

毛主席精准添“新”字

曹火星回忆说:“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做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党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人民群众为抗战送儿、送夫参军,支援前线流血牺牲……就我本身来说,一个普通的农村小孩子,不愿意当亡国奴,而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是党培育我成长,是党给了我文化知识,成为一名革命文艺战士……没有党怎会有今天?我讲了真理,说了实话,写了实情,反映了人民的心声。”的确,来自他内心深处最强烈、最质朴的声音,道出了亿万中国人民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关于歌名中增“新”字的变化,后来有几种说法。

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源于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著名党史专家逄先知(早年曾是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助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6年),以及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李银桥(跟随毛泽东15年,先后任卫士、卫士组组长、副卫士长、卫士长)等同志,逄先知曾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的文章中、李银桥在其回忆著书里,都提到以下细节:

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听到女儿李讷在唱这首歌时给予了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的“一字师”极其了不得,歌名在“中国”前加上一个“新”字,更为准确;一个“新”字,神来之笔,也让这首歌成为歌颂党的经典之作、真理之歌。

从此,就有了流传至今的这一段经典旋律。此歌久唱不衰的魅力在于:鲜明道出亿万人民心声,唱出颠扑不破的真理!

拾遗

刘亚楼:晕机的空军司令

1932年4月20日,红军攻占漳州后缴获了一架在此前战斗中击伤的飞机。飞机被命名为“马克思”号,这是红军的第二架飞机。听说缴获了飞机,不少高级指挥员都来看。时任11师政委的刘亚楼更是围着飞机钻上钻下,想探探这个能上天的铁家伙的究竟。毛泽东看到刘亚楼对飞机这么感兴趣,就打趣说,“以后有了空军,一定让你来搞!”

没想到17年后,这句玩笑话居然成真。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准备率部南下作战的刘亚楼接到党中央命令,负责组建人民空军。

1949年8月,刘亚楼去莫斯科与苏方谈判援助组建人民空军事宜。“从苏联远东城市赤塔乘飞机经过西伯利亚的时候,飞机因为气流颠簸得厉害,我父亲在飞机上吐得东倒西歪。和他一起去的吕黎平、王弼一边照顾他一边开玩笑说,你这个将来要当空军司令的人怎么还晕机啊?”刘亚楼将军的女儿刘煜鸿说。

多年以后,毛泽东见到刘亚楼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还风趣地说:“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机,这就是我的干部政策。”

蔡元培:给校工涨工资

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主政北大期间,求贤若渴,向全国聘请一流学者任教授与讲师。一时间,辜鸿铭、胡适、陈独秀、梁漱溟、周作人、刘半农等都来到了北大,北大可谓大师云集,人才济济。

一段时间后,蔡元培发现,北大作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学生众多,仅有大师是不够的,还需要背后默默奉献的校工,后勤补给这块的任务特别繁重。清晨,校园的第一声钟由一个校工敲响。只要是上学期间,无论刮风下雨,敲钟的校工准时到岗。每天如此,从来没有缺席过。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学校需要烧煤取暖。烧煤的校工早起晚睡,保证按时供暖。学校的电工,他们不仅在学校维修,教授家里的电灯、电话出了问题也找他们。还有那些打扫卫生的校工,他们每天往往是披星戴月……在北大,最辛苦的人就是这些校工。

蔡元培要让普通劳动者——校工也要活得有尊严、有奔头、有希望。所以他决定给校工涨工资。消息传出,在北大校园惹起了争议,有些教授认为校工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应该拿低工资。

蔡元培力排众议,他说:“虽然校工没有文化,但他们投入了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时间成本。北大光有大师是不够的,还有背后默默奉献的这些校工,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工资涨了后,校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热情特别高。另外,蔡元培每次迈进学校大门,他都会摘下礼帽,向迎接他的校工们鞠躬致谢。

叶楚伧:嗜酒如命

国民党元老叶楚伧嗜酒如命,1916年,他与邵力子合办《民国日报》并担任总编辑,报馆穷得常常连员工的工资发不出。叶楚伧就把老婆的首饰送进当铺,借以维持报馆的开销。即使这样,叶楚伧还是每晚坐在编辑室里,一壶酒与一包花生米是少不了的,边喝边嚼边工作。

抗战爆发后,叶楚伧随国民政府西迁,由南京而武汉,再由武汉而重庆,都挂着秘书长的重要头衔。谁知1941年他却突然辞掉秘书长一职。至于原因,一种说法是:某日叶楚伧在与蒋介石通电话时,蒋问叶楚伧有没有重要事情,叶回答说有三件公事须请示。当蒋赶到中央党部时,叶却因酒喝多了,将“公事”忘得干干净净。蒋无奈返回军委会后,叶突然又记起来了,于是再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嘱咐他赶往军委会面谈。不料,叶出发前忍不住又喝了几杯,结果,赶到军委会后,又将“公事”全忘了。

溯源:办事失败为何叫“砸锅”

“砸锅”属于北方方言词,人们常用“砸锅”来比喻办事失败了。这个“锅”并非烧饭做菜之锅,而是来源于戏曲界的“两下锅”“三下锅”等术语。

清末民初,北方的京剧曾与山西梆子、直隶梆子(今河北梆子)同台演出,而剧目、表演等又仍保持各自原状不相混合,俗称“两下锅”。南方的滇剧,其腔调包括襄阳、胡琴、丝弦三种,原来唱一种腔调,后来逐渐变为三种腔调混合演,俗称“三下锅”。在这里,“锅”已成了“戏”的代名词。旧时,人们常用“砸饭碗”比喻失业,如果戏演得不好、演不下去了,就称演“砸锅”了。

为什么用“砸锅”而不用“砸瓢”“砸盆”呢?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生的前提要义。“人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件也离不开“锅”。“锅”是千家万户最主要的炊具,关乎每个家庭的吃喝。正因为“锅”是如此的重要,所以人们把事情办坏比喻成“砸锅”。

反腐敢碰硬的“硬黄”黄绂

张壮年

黄绂,字用章,号精一道人、蟾阳子,明朝平越卫(今贵州福泉)人,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的进士。为官后,由南京刑部员外郎郎中一步步升迁至南京户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黄绂为官廉峻刚直、公正严明、不畏权贵、疾恶如仇、敢于碰硬,被人誉称为“硬黄”。

黄绂初任刑部郎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别人都不敢办的案子。南京有一个谭姓千户,此人官虽不大,却极善权谋、背景复杂,经常倚仗权贵的势力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当地官员都不敢惹他。谭千户强占了百姓万亩芦场,被人告到官府,官吏们竟不敢接这个案子,相互推诿,拖着不办。黄绂闻知大怒,挺身而出,主办此案,他不惧权贵,公正办案,经过深入查究追索,查清了案子,最终将谭千户侵占的万亩芦场还给了百姓,并严惩了这个谭千户。

黄绂在任四川参议督松茂兼兵备道时,不惧权势、严惩贪官污吏、打击黑恶势力。这期间,他擒拿土豪恶霸数百人,弹劾了一批不法将官,使地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期间,有一个掌管仓库的官吏是节阳王的亲戚,贪污官粮数万担,因有节阳王庇护,没人敢问,黄绂得知后,毫不畏惧、依法办事,硬是将其绳之以法,处以极刑,并惩处了仓库里有关的贪官污吏。

黄绂还曾办过一个奇特的案子。那是他任四川左参政时,在一次巡视途中,发现一座大寺庙,寺庙倚山而建,旁边有一大湖。黄绂走进此庙时,发现大庙主持年仅三十多岁,而且眼含凶光,再看佛像身上满是灰尘,便感到很可疑。待回到驻地时,得知此地有多人失踪。于是,他立即派兵包围寺庙,捉拿和尚。经审讯令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些和尚都是歹徒所装扮,干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们常常夜间出动,将人杀死沉于湖底,然后瓜分财物,将劫来的妇女藏于洞穴之中,供其淫乐。审讯清楚,黄绂下令诛杀和尚,捣毁寺庙,救出被劫妇女,为百姓除了一害。

黄绂对贪官污吏、黑恶势力疾恶如仇,严惩不贷,对百姓则关怀备至、处处为百姓着想。有一次,黄绂到边塞巡视,发现边塞士兵的妻子衣不遮体,他心酸地叹息道:“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意思是说,边防士卒的家如此贫困,我有何脸面做这里的巡抚啊。于是,他顶着压力,千方百计地为士兵争取到了三个月的兵饷,并亲自抚慰他们,帮助他们安顿家室。当黄绂离开边塞时,士卒们携妻带儿跪在道边相送。

黄绂之所以敢于碰硬,不惧权贵,敢于冒着风险为百姓谋取利益,是因为他心中装着百姓,想着国家,没有私念,因为无私,所以无畏。

绰号里的廉政故事